

本欄有幾則讀者感言，都是由2月號有關全球化問題一組文章引發的，或針對學界抓不住真問題，或進一步抒發己見。言論不多，觀點各異，卻更見真性情，正顯本欄特色。

十年前，正值思想解放運動高潮時，召開了不少紀念五四7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現在翻閱當時出版的有關論文集，仍可感到知識界充滿活力和自信的精神風貌。但是到了90年代末，思想貧乏和犬儒主義似乎成為流行的慢性病。儘管如此，在又到忘不了的五四運動80年之際，五四研究和五四精神，仍然是中國知識份子不得不談的話題。

——編者

接軌前，先看看問題真假

《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號上發表三篇有關全球文化的文章，我仔細地看了，思考再三。我對參與這一討論的三位作者抱有敬意。但對西方校園內的批判理論和左派立場心理距離很大，在學理上也有懷疑，他們提出並引起注意的「問題」難以引起我的思想興奮。我的問題是：八九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是在西方學界的視野外突然發生，越近八九，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穩定越持肯定態度，轟然一聲，八九事變卻在他們的背後發生；因此，八九在政治上是蘇東統治的失敗，但在學術上未必不同時是西方學界有關領域的學術破產。他們應該有像樣的反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省。最好在反省這一學術破產的基礎上，他們再來談全球化問題，尤其涉及東西方關係的全球化問題。遺憾的是，八九後我兩次到哈佛，都沒有看到他們像樣的學術檢討，看到的是搖身一變，又來談論冷戰後的東西方關係。這種情況，左右兩翼都存在。比如亨廷頓，八九前出版的《變革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心觀點是：「統治穩定的秩序，就是有效統治，因而是合法統治」；八九後卻沒有一個說得過去的交代，便立刻出版《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前後學理判若兩人，難以服人。我的這一問題，其實金觀濤在80年代即已提出，二十世紀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實踐全球範圍的失敗。我至今認為這是一個不應忽視的真問題。可惜，真問題總不能持續吸引人們的注意。而國內學界則忙於與國際學術接軌，一不小心，可能接上的恰恰就是那邊的假問題。他們可能是以一個假問題來掩蓋此前在真問題上的失敗，而我們呢，為甚麼以激進的先鋒姿態把他們的假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引進國內？國內忙於學術接軌的朋友，多半迷戀他們的後殖民理論，卻有可能在引進這些先鋒理論的同時，把他們的假問題也引入進來，掩蓋了發生在這塊土地上

的真問題。這樣一來，可能是在批判殖民化的聲浪中，最好不過地實現了西方學術對中國的殖民化。

朱學勤 上海

99.3.4

應該在全球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國問題

《二十一世紀》今年2月號上以「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世界」為題的一組文章非常值得重視。當今的全球化並不是甚麼美妙無比的事情，它越來越暴露出冷戰時期人們未曾預料到的問題。這對以「走向世界」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會有不小的衝擊。確實，正如早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問題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了，它與全球化的背景息息相關。而如何在新的視野下重新考慮中國問題，首先是如何反思80年代以來的對於中國問題的提問方式，應該得到進一步的探討了。

比如，人們以前專心於研究人民民主政體中「人民」與「民主」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思考的前提是設定了自由民主政體是完善的、統一的。但是，這個前提在如今的「全球化」浪潮下卻不攻自破。佐伯

啟思在〈虛構的全球主義〉中深刻地指出，自由與民主之間出現了尖銳的對立，被視為當然的自由民主主義理念內部同樣也是充滿緊張的。當這種前提被動搖以後，對人民民主理念的思考方式也應該有所變化了吧。

再如，對自由的認識，「消極自由」一詞因其反專制的效應而在漢語學界廣為流行，佐伯啟思卻不無道理地說它「就是支撐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這應該提醒那些真誠和善良的自由主義者，必須要重新定義這個永遠是美麗但卻又永遠是模糊不清的概念。自由是僅僅在「不強制」的狀態下便可以實現的嗎？批評家韓毓海卻說，這種理論很有可能將市場社會使他人「自願地作奴隸」的行為合理化。事實上，如果不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上思考問題，自由這個詞同樣非常容易墮落為市場強權的保護傘。

薛毅 上海
99.3.22

豈止沒有「終南捷徑」

《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號上佐伯啟思的〈虛構的全球主義〉，分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80年代的全球化引發了一種新的現代化樣式，從日美導入資本，東亞諸國都出現了一批「超級現代都市」，孤島般聳立在廣漠的前現代農村背景中，「彷彿越出各自國家發展的原有階級」。古典的現代化進程（即輸入西方觀念和科學技術，製造中產階級，實現經濟的自由化等等）被省略了，

全球化似乎使東亞國家走上了一條現代化的「終南捷徑」。

但1997年的金融風暴使得這些「超級都市」經濟崩潰，如果認為這是亞洲式的「不正確的市場」引致該處的金融資本向以美國為代表的「正確的市場經濟」的流動，那麼，推論就是在亞洲也應建立「正確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放棄多快好省的「終南捷徑」，從頭做起，完成整個社會結構和經濟體制的轉型和重整，告別「親友資本主義」或「官商勾結的經濟」。中國現在倡導的與國際接軌（尚僅限於經濟—技術領域）即是此一思路。

不過如佐伯啟思所說，市場靠交易慣例及人們的信賴構造才能順利運行，這一切與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息息相關。所謂「正確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與美國經濟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亞洲國家即使願意放棄其民族主義，要求並接受這一意識形態，也很難徹底改造其社會結構與歷史文化。所以亞洲國家不太可能通過漫長的學習過程來建構「正確的市場經濟」（勤於學習的日本也免不了風暴的襲擊）。

可見，利用朝秦暮楚的國際流動資本建立一個個孤島般的超級都市風險太大，而全面改革與國際（美國）接軌又困難極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東亞模式的終南捷徑走不通，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現代化的一般道路也不行，那麼亞洲國家該何去何從？

佐伯啟思把保證國內經濟不受短期資本的無常影響、實現國家獨立性和保護國家利益的任務交給國家，以此來證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依

然需要且面臨更加艱難的課題。但國家如何才能完成這一任務？佐伯啟思並沒有論述。希望能讀到他在這一方面的論文。

單世聯 廣州
99.3.24

「大同」社會的社會主義傾向

貴刊1999年2月號上發表了張隆溪先生的〈烏托邦：世俗理念與中國傳統〉，從歷史文化與中西比較的角度談到了中國文化中的烏托邦思想傳統。文章指出：作為一種社會理念的烏托邦「雖然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也有根本的一點貫穿始終，那就是廢除私有制、人人平等的集體主義觀念」。正因為這樣，所以一切烏托邦似乎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這一觀察可謂深得我心。

不妨在此補充幾句。我覺得正是中國「大同」社會的烏托邦文化想像，使得社會主義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比如說，中國現代的保守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雖然在其他方面打得不亦樂乎，但是在親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上似乎就相當一致。保守人士如梁漱溟、杜亞泉等無疑具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親社會主義傾向，這使得他們對私有制以及與之相關的一整套價值取向與制度設置，特別是利己主義的價值觀、私有財產制度等，都持反對態度。從時代背

景上說，這種反資態度雖然與當時西方知識界由於一次大戰引發的反資氛圍相關，但更重要的似乎是：保守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價值的拒斥，主要原因還在於它與中國傳統文化關於「大同」社會的價值關懷相牴牾，而社會的價值理想（如平均主義）則正好與中國儒家道德倫理相合。

西方的社會主義常常作為一種時髦理論而被引用，但是其根源恐怕還是傳統價值觀在起作用。復由於中國的知識份子無論保守激進都無法擺脫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從而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社會主義的親和，成了保守派與激進派少有的共同點之一。激進主義的代表之一陳獨秀早在1915年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就顯得對社會主義情有獨鍾。他把社會主義當作近世文明「三大件」之一，同

時又是反對近世文明的「最近文明」。他說：「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之制度破壞無餘，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此制雖傳之自古，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以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這的確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

陶東風 北京
99.3.22

公正地對待胡趙

貴刊去年12月號孫長江先生的〈真理之爭二十年〉一文，回顧了二十年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那段重要的歷史，我想特別補充一點的是，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起過特殊的作用，這是歷史事實。但是，在1987年初的「倒胡」運動的陰影下，這個作用往往被抹殺。如1988年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十周

年時，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一系列紀念文章中卻根本不提胡耀邦的名字。據悉，當年胡績偉曾有一篇題為〈唯書、唯上，還是唯實——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十周年〉，本是為《人民日報》寫的，其中有兩處提到胡耀邦，《人民日報》負責人建議他刪去，胡績偉認為這是歷史，不能刪，就把該文給了《光明日報》，發表了出來。去年的情況有所不同。在5月8日的座談會上，有三個人在發言中肯定了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作用。其一是胡耀邦當年的秘書、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但在去年12月紀念三中全會20年的各個政論電視節目中，只有胡的相片，而未提他的名字；對趙紫陽在改革開放中的貢獻隻字不提，更是無視剛剛過去的歷史。這符合實事求是嗎？

靳巖 北京
99.3.4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4 伯爾曼提供。

頁17 于連提供。

頁26、27 劉小軍作品。

頁30 史定梅主編：《追憶——近代上海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03。

頁46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光輝的歷程——中國共產黨七十年歷史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8。

頁55、77、97、98、111、114、146、153 資料室圖片。

頁56、62右 Jürgen Habermas,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8), cover.

頁62左 Jürgen Habermas,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7), cover.

頁72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封面。

頁74 John Horgan, *The End of Science*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96), cover.

頁78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封面。

頁81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封面。

頁84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cover.

頁87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封面。

頁92、93、96、封三、封底 梅青提供。

頁99上 *Science* 264, cover (20 May 1994).

頁99 (A-E) *Science* 264, 1104 (20 May 1994).

頁100上左 *Scientific American*, 12 (November 1998).

頁100上右 *Science* 268, 1631 (16 June 1995).

頁100下左 *Science* 282, 1847 (4 December 1998).

頁100下右 *Science* 280, 201 (10 April 1998).

頁109 劉溢：《生生無已》（*Mother Nature*, 1991）。